



Passage To Manhood

Youth Migration, Heroin, and AIDS in Southwest China

我的涼山兄弟

毒品、愛滋與流動青年



這是一本微觀與鉅視兼具，令人讚嘆的醫療民族誌。一位年輕的女性人類學者勇敢地跨入海洛因與愛滋病蔓延的偏遠山區，以濃郁的情感與關懷，細膩地記述、剖析她涼山諾蘇族兄弟們在現代化浪潮中經歷的輝煌又慘烈的青春探險，以及反毒病成效不彰的體制性因素與文化污名。

劉金莉
Li Jinli



我的涼山兄弟

毒品、愛滋與流動青年



劉紹華



我的涼山兄弟

毒品、愛滋與流動青年

作者：劉紹華

總編輯：劉鈞佑

編輯：黃恩霖

出版：群學出版有限公司

地址：新北市新店區中正路508號5樓

電話：02-2218-5418

傳真：02-2218-5421

電郵：service@socio.com.tw

網址：<http://socio123.pixnet.net/blog>

郵撥：19269524 群學出版有限公司

封面：井十二設計研究室

印刷：權森印刷事業社

電話：02-3501-2759

ISBN 978-986-6525-67-4

NT\$380

2013年1月 一版1印

2013年3月 一版2印

著作權所有・翻印必究

我的涼山兄弟：毒品、愛滋與流動青年
劉紹華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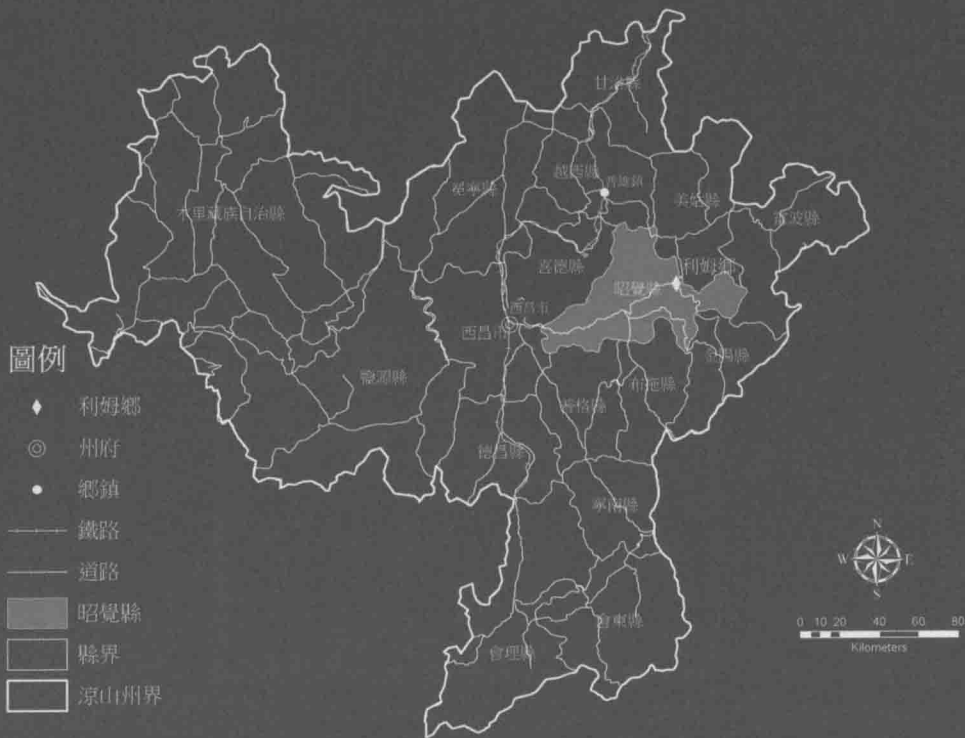
一版，新北市：群學，
2013.01 面：公分
ISBN:978-986-6525-67-4
(平裝)

1. 區域研究
2. 四川省涼山彝族自治州

672.79/361
101027198



地圖一：涼山彝族自治州



地圖二：涼山州昭覺縣

「我們有如橄欖，唯有被粉碎時，才釋放出我們的精華。」

——赫拉巴爾，
《過於喧囂的孤獨》

推薦序 一位優秀的台灣年輕學者

抗日戰爭期間，國民黨的空軍作戰及維修部隊，一路南遷，由上海而漢口，由漢口而西安，而重慶，最後打到了滇緬邊區。我的父親是個低階的空軍維修士兵，他在雲南騰衝時娶了我的邊疆少數民族的母親。他的同事娶西南少數民族妻子的極多。後來台灣的空軍低階眷村就有很多媽媽是雲南的白族、苗族、傣族。

我的母親乃是中國西南少數民族中的擺夷族。根據中國民族學者江應梁在《中國民族史》裡的敘述，擺夷族是傣族的一部分，乃稱白夷，有山擺夷、水擺夷、花擺夷之分，散布在黔、川、滇一帶。擺夷和許多其他的西南民族混居，西南民族中的「僮羅」、「保羅」，即後來被稱為彝族的，當年就是我母親常提到的話題。早年眷村同姓之間彼此都互稱「家門」，就是繼承自「保羅」的說法。

我對中國西南民族的事一向關心，除了有血統上的近親關係外，西南民族在近代歷史變化中所受的創傷，也一直縈繞我心不能或忘。中國的西南早在唐紀就已有種鴉

片的記錄。唐文宗時的一個四川進士雍陶就寫過：「萬里客愁今日散，馬前初見米囊花。」米囊花就是今日罌粟花的古稱。但由古代的歷史記載，中國西南雖然極早就已知道種罌粟花，但多半只用來作藥引或入藥之用，沒有大規模的種植。但到了清朝道光年間，一則由於洋鴉片大舉輸入，中國上流社會抽鴉片入迷，另外則是清廷腐敗，西南民族地區生活困苦，於是西南民族地區大量種鴉片遂告開始。根據中國民族學者況浩林在《近代少數民族經濟史稿》中所述，清末西南地區的四川、雲南、貴州已成了鴉片中心。就以一九〇六年而言，中國當年生產鴉片八十四萬擔，一擔合一千六百兩，單單四川即產廿四萬擔，佔中國自產的二八·五七%，四川可耕地的一六·四%都用來種鴉片；至於雲南則產七點八萬擔，佔中國生產的九·二八%，雲南可耕地有二六·七八%都用來種鴉片。西南的鴉片可以銷售到陝西、山西，最遠可能到兩廣和江南。到了民國時代，由於政治腐敗依舊，西南民族地區種鴉片依然猖獗。雖然中央宣稱禁煙反毒，但上面說一套做一套。就以四川為例，說是禁煙反毒，但四川禁煙總局局長李春江就是鴉片販售公司的最大股東。雲南省長龍雲的妻弟李培炎也是鴉片最大的商人。當年四川省彝族地區的金陽縣就以種植鴉片聞名。

中國西南民族種植鴉片的那個噩夢時代，現在當然已成了過去，現在亞洲的鴉片

及海洛因的生產，已轉移到了緬甸撣族的金三角和阿富汗。但中國西南邊疆少數民族的毒品噩夢並未因此而成爲過去。隨著中國毒品問題趨於嚴重，注射毒品所造成的愛滋也告滋生，而最嚴重的就是醫療條件及經濟條件極爲不利的西南民族地區。

根據中國旅美公衛學者黃延中於二〇一一年年末號美國《外交事務》雙月刊上的專文，近年來中國醫療條件日益惡化，中國的愛滋、肺病、B型肝炎、狂犬病都極嚴重。就以B型肝炎爲例，中國帶原者即有一億三千萬人，佔全球的三分之一。二〇〇八年中國衛生部做了一項調查，在最近兩週來爲各種慢性病所苦的即達六一%。十年前才只有三九%。二〇一〇年的調查，也發現中國的糖尿病人口世界第一，超過二十歲的成年人裡，有一〇%有糖尿病；中國衛生部的資料亦顯示，在二〇〇三至〇八年間，由於心理異常的事故增加了五〇%。將比例換算成總人口，大約二點二七億人有某種心理的癥候。而在政府的醫療投入上，自從一九八〇年代初，毛時代的公衛體系結束後，中國醫療的投入即日益減少。一九八〇年醫療的投入爲GDP的一·一%，到了二〇〇二年只剩〇·八%。「文革」固然過大於功，但對偏遠地區的醫療至少有一定的改善。一九七六年時，全中國有一八〇萬赤腳醫生，九〇%的基層社區有一定程度的醫療服務，死亡率也由一九四九年的每千人死亡廿人降爲一九七五年的七人；

一九七八年，八二%基層有合作診療，到了一九八三年已急降為一一%，同一時間赤腳醫生的數目減少了二三%。到了二〇〇四年，政府醫療支出有八〇%都在都市醫療機構，而都市居民只佔全中國人口的四二%。二〇〇六年時，中國衛生部副部長表示，中國的政府醫療預算，有八〇%都用在八五〇萬軍公教身上。二〇〇四年中國衛生部副部長表示，中國農民由於缺乏醫療，有六〇至八〇%的人都病死在自己家中。二〇〇〇年「世衛組織」在全球一九一國裡，將中國的醫療條件排名第一四四名，只有到了二〇〇九年，中國政府才擬定三年計劃，擴大醫療投入到一七三〇億人民幣。由於政府的承諾，醫療的投入比例才由二〇〇二年的一六%增至二〇一〇年的二四%，但這仍完全不夠。例如在二〇一〇年，政府對每個農村人口有「合作醫療」的補助一二〇元人民幣，但這只佔每個人醫療支出的八·六%。如此惡劣的醫療條件與能力，中國大陸的農民，或者情況更糟的西南民族，他們在面對愛滋這種致命的疾病時，其情況當然更慘烈。

近年來，四川的涼山州愛滋問題至為嚴重，是中國的愛滋病患重災區。涼山州乃是四川西南的彝族自治州，面積六萬平方公里，比三萬六千平方公里的台灣大了一點六倍，人口才四百萬，其中諾蘇人（四川彝族）佔四四%，漢族則佔五二%，其餘的

少數則為藏族和其他更少的民族。但諾蘇人佔四川人口的比例不到3%，但二〇〇一年的調查即發現諾蘇的愛滋感染者卻佔了四川的五九·五六%。到了二〇〇七年，涼山的愛滋感染通報案數已經增加到五〇九〇人，愛滋可謂已相當的氾濫。

而這本《我的涼山兄弟：毒品、愛滋與流動青年》，乃是本書作者劉紹華博士於二〇一一年由美國史丹佛大學出版社所出的英文本改寫而成，該英文書同時也收入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的叢書系列，本書顯然是作者博士論文計劃的一部分。作者以四川涼山州昭覺縣的利姆鄉為她的田野地，作者對該地做了極其敏銳而深入的醫療民族誌的觀察，本書可說是台灣當代年輕輩學者所寫的醫療疾病人類學的典範之作。它雖然寫的只是小小的四川涼山州的幾個小鄉村西南民族的吸毒及愛滋問題，但透過該書多層次的觀察與討論，該書其實已將後社會主義中國之醫療困境和西南民族的文化困境和各層次衝突做了顯示，由本書我們可以看出，中國的西南民族是如何透過愛滋與社會變化的洗禮，正莽莽撞撞的以不可知的步伐，走向未來的現代社會，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在侷限的環境下，仍發揚著人的主觀能动性，或者認命或者離經叛道的摸索著他們未可知的未來。因此這本書雖是部人類學著作，但真正而言，它其實是西南民族集體所寫成的生命之書。

人類學及民族誌並非我的學術專業，但我對思想史則有著專業性的閱讀興趣。在一九八〇年代，我首次讀到傅柯的弟子、疾病史專家狄拉波特（Francois Delaporte）所著的《疾病與文明：一八三二年巴黎霍亂之研究》，該書為疾病社會史的經典之作。該書指出，當一種重大的疫病來襲，這個疫病就會像個外來的力量，打散了那個社會統治與被治、官僚與非官僚、人民之間的階級族群，各種慾望、想像、恐懼、權力、猜忌、夢想全部在疫病時出現。因此狄拉波特遂有他那句學術名言：「疫病並不存在，存在的並非疫病而是實踐。」他並不是說沒有疫病這種東西，而是疫病產生的各種論述才是更大的課題。近代人類學宗師吉爾茲（Clifford Geertz）也指出，一種事件所引發的文化、歷史、信仰等多層次的互動乃是更大的重點。近代思想家蘇珊·桑塔（Susan Sontag）那本《疾病的隱喻》，也只是用更概念的方式來談疾病引發的多層次意義故事。

四川涼山州的彝族，他們在後社會主義階段的中國，現在新自由主義的個人放任當道，政府對人民的醫療及生活照顧廢弛，他們面對毒品的誘惑的風險增多，他們到城市的冒險機會也增多。對於貧窮、注射毒品及愛滋，已成了他們生命另一種悲多於喜的生命交響曲。這個曲子最後會怎麼奏下去，大概很少人知道。不過由於它的悲劇

多過喜劇，他們的生命之歌終究讓人神傷。

我的母親是雲南的擺夷族，所以中國西南邊疆的少數民族都算是我血統上的親戚和鄰居，這也是長期以來我對西南少數民族問題特別關切的原因。這也是劉紹華這本傑出的學術著作，除了讓我有學術上的興趣外，這部著作也勾起了我的鄉愁。但願四川彝族的那些鄰居，他們未來的生命之書會有好的終曲！

南方朔（政治與文化評論家）

推薦序 千山獨行

文化行爲與疾病之間的錯綜複雜關係，從一九三〇年代開始，就已受到人類學者的注意。早期研究如北美 Algonquin 印第安人的「極地食人妄想症」(Windigo Psychosis)，或東非阿贊迪人(Azande)傳統法醫以驗屍來鑑定死者是否遭受敵人的巫術傷害等，都是聚焦文化來解釋特殊的疾病或生理現象(culture-bound syndromes)。這種研究旨趣直到一九七〇年代仍受到跨文化心理學者，如香港中文大學 Michael Bond 教授的重視，並從此角度研究東亞文化圈的「縮陽」，或馬來人的 Amok 等心理症狀。至今醫療公衛領域亦常借用此類觀點。

一九七〇年代以後，醫學人類學強調文化特徵與特殊疾病之間聯結的解釋架構，已有基本改變。學者擴大其分析視野，不僅重視解釋病因的文化面向，亦強調將疾病放在更大的政治經濟框架下，做整體性檢視。這種新研究取向，讓我們注意到疾病與深層社會結構之間多重糾纏的因果關係，如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醫療資源分配不

均、全球區域發展差異使「南方」成爲「北方」新藥實驗場、社會階層分化削弱邊緣團體的復健能力（resilience）、城鄉差距縮減農村平均餘命、疾病被污名化、文化的力量等。雖說當代醫學人類學在歐美早已是炙手可熱的學科分支，且不斷在理論與研究議題上推陳出新，但在台灣卻長期未得到應有的重視。這種狀況，直到劉紹華博士這個研究個案出版，才有根本的改變。

近年來已有不少學者與學子還願意探索困難的社會議題，並從事艱苦的田野調查。劉博士憑著過人的勇氣、才智與毅力，以海洛因及愛滋爲切入點，檢討中國涼山諾蘇人何以在改革開放後，迅速淪爲雙重污名（即落後的奴隸社會及愛滋蔓延）的重災區。她的分析一方面採取貫時性研究（diachronic approach），追溯諾蘇人與解放前漢民族國家之間的區隔與對立，以及鴉片在其中扮演的複雜角色，如何影響當代諾蘇人對鴉片類毒品的特殊態度。另一方面，劉博士以現時性研究（synchronic approach），深度參與當地鄉民的生活，獲得他們的信任，才得以進行高度困難的敏感性研究，深入瞭解毒品使用者和愛滋患者的內心感受，發掘他們在追求現代性時的渴求、衝動、徬徨與後果。這兩種研究方法交織在一起，生動地勾勒出一個完整圖像，讓我們瞭解諾蘇人所面臨的時代動盪與困境。

建基於十年紮實的民族誌田野材料上，本書提出幾個重要學術觀點，對未來中文世界人類學理論討論或醫學人類學的發展有重要貢獻。第一，作者使用傳統人類學的「通過儀式」(rites of passage)成年禮來解釋涼山諾蘇青年追求現代性的多重意涵。雖然通過儀式一詞近年來為許多社會學、心理學者等借用，解釋年輕人在青春期所經歷的適應階段，但本書更將之擴大為一雙重隱喻，不僅指涉涼山男性青年在追求現代性過程中所經歷的階段性成長和付出的代價，同時也意指社會主義中國在一九四九年後，為追求現代性所經歷的重大實驗性轉折和犧牲。這個兼顧宏觀現象（社會主義中國）與微觀個案（涼山諾蘇青年）的研究成果，應會成爲人類學經典著作。

本書第二個重要貢獻，是對全球化發展趨勢及其理論的挑戰。在全球化浪潮下，世界各地的行爲模式、社會制度、倫理規範等都有漸趨一致的傾向，並被視爲普世價值。本書卻指出這種假設有其根本問題。譬如說由國際組織在當地推動的愛滋防治計畫，其中包含反污名的標準作業，但這看似善意的前置作業，在原本對愛滋並不帶有歧視眼光的諾蘇社會，反而造成新興的污名化後果。換言之，作者指出全球化的作爲，必須考量本地文化特色，適度調整，才有可能避免根本的錯誤。

這本書是中文世界難得的醫學人類學民族誌。在本書英文版出版兩年內，劉博士

又努力將其譯寫為中文書，並做出許多修改，配合中文讀者的閱讀慣習，文筆流暢優美，將理論融會貫通於清晰的文字之中，可讀性極高。其勤奮治學的態度，足為未來人類學者之楷模。基於上述理由，我全力推薦本書為人類學與民族誌研究的基本必讀範本。

黃樹民（中央研究院院士）